

從相互依存¹的角度看冷戰後中美關係的發展

◎ 朱聽昌 黎 翔

1991年，超級大國蘇聯崩潰與一旦，中美共同的戰略對手消失，致使兩國失去了基於安全考慮的戰略合作基礎，雙邊關係受到了巨大衝擊。而此時的世界，已打破冷戰樊籬的隔閡，擺脫東西對峙的束縛，走向全面的大融合。國與國之間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不斷加深，非國家行為主體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不斷增強，軍事因素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相對下降，經濟成為國際關係中的主要議題。相互依存已成為國際關係領域的一種重要現象和顯著特徵，中美關係也深深印上了這一時代烙印。本文嘗試在吸收相互依存理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不再將國家視為一個鐵板一塊的整體，而是以冷戰後中美兩國迅速發展的經貿聯繫為切入點，對中美關係相互依存的新特點進行歸納總結，並對非國家行為體（國際組織、經濟利益集團、跨國公司等）和次國家行為者（政府官僚機構各部門）的互動和隨之而來的影響進行研究，還對國家外交戰略的選擇、國內決策過程以及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過程進行探索，最後提出作者對發展中美關係的建議。

一、冷戰後中美經貿關係日趨加深

1990年代初，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中美兩國深深地捲入了全球生產體系。中美本來就在資源條件、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以及消費水平等要素稟賦結構方面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加之世界市場經濟體系的連接和推動，兩國經濟逐漸成為一個密切聯動的有機整體。據中方統計，中美兩國貿易總額從1991年的142億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804.9億美元，年均增長達到18%。其中，中國對美國出口年增長率平均為31.43%，進口年增長率平均為16.08%。按照美方統計，中美兩國貿易總額從1991年的252.7億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215.1億美元，10年中平均增長率達到17.2%。²另一方面，兩國雙邊貿易在本國貿易總額中所佔比重也增加了。1977年美國同中國的貿易在美國貿易總額中只佔0.1%，但到了1992年已佔到2.5%，中國成為美國第十大貿易夥伴，1996年又升為第四大貿易夥伴。1977年美國同中國的貿易在中國貿易總額中只佔2.2%，到1990年卻佔到了17.6%，成了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1996更是一躍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日本。³

中國主要向美國出口紡織品、服裝、鞋、玩具、家用電器等勞動密集型產品，主要進口美國高技術產品和先進設備。美國主要進口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產品，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製造業產品。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成本降低了鞋、服裝、玩具等日常生活用品在美國市場的銷售價格，緩解了美國的通貨膨脹壓力，使美國消費者得到實際好處。世界銀行1994年的分析報告指出，如果美國從中國以外的國家進口同樣的商品，美國消費者每年需要增加140億美元的支出。⁴對於美國來說，中美經貿交流不僅使美國消費者和企業直接獲利，而且對美國宏觀經濟增長也產生重要影響，有助於美國優化資源配置和調整產業結構。美國大量進口相對廉

價的日用消費品等，提高了國內的有效總供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貨膨脹，為美國經濟實現低通脹下的增長創造了寬鬆的宏觀經濟環境。據估計，如果沒有中國的消費品，美國物價指數將上升兩個百分點。⁵

通過與美國進行經濟交往，中國引入了先進的機制、管理經驗和科學技術，提高了中國的國際競爭力。與美國的經貿往來，促進了中國貿易和投資自由化，豐富了中國的國內市場，給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金。美國的廣闊市場還為中國企業走向世界，在參與中發展壯大提供了巨大的機會。鄧小平曾指出：經濟上互相幫助應成為中美關係的一個重要基礎。中美之間雖然存在著一些糾葛和分歧，但兩國在發展經濟、維護經濟利益方面有互補性。⁶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也曾表示，「在失去共同的敵人之後，經濟貿易關係將成為中美關係發展的幾個基軸之一」。⁷中美經濟相互依存加深使雙邊關係破裂的經濟代價愈來愈高昂，從而減緩了安全 and 政治領域的分歧給兩國關係帶來的衝擊，成為中美關係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基礎。

二、中美關係趨於相互依存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相互依存產生聯帶作用使兩國政治關係也出現相互依存的趨勢。兩國政治關係雖然仍時起時落，但這種波動的周期明顯縮短。緊密的經濟聯繫拓寬了兩國交往的渠道，使其多樣化、多層次化；還加強了兩國具有共同利益的群體，這些群體對兩國關係的發展產生了日趨擴大和獨立的影響。中美關係逐漸趨於一種相互依存狀態：

（一）非政府行為體的作用大大加強。隨著經濟交往的加深，美國跨國公司與中國建立起直接的、日益緊密的聯繫，並且開始獨立地觀察或分析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法律體制、社會穩定等各種問題。由於跨國公司長期在中國投資和經營，對於中國的政經情勢與社會狀況都有相當程度的認知，成為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制訂的重要參考來源。在中美關係發生波動時，他們能夠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在中美間進行疏通和調解，並經常創造一些非正式政治關係的個人接觸，為兩國領導人傳達信息、溝通思想提供了便利。中美兩國都希望利用美國跨國公司的政治經濟影響力來平衡兩國關係，增加權力運作的條件。中國以市場的經濟利益為杠杆，借著美國跨國公司對美國政府的影響力，在特定的議題中發揮游說、溝通作用，來增加中國對美談判的籌碼。另一方面，由於美國跨國公司與美國的依附關係，跨國公司成為美國謀求全球經濟霸權的有力工具，美國政府利用治外法權控制出口以約束海外子公司的行為，通過限制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來對中國施加壓力。

由於中美貿易的不斷擴展，在中國本土也興起了一大批以對美出口為龍頭的企業，這些企業大多具有發展快效益高的特點，對於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起著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這些企業要求一個穩定、開闊的美國市場，拿出大量經濟數據向中國高層表明維護中美關係的重要性，通過對經濟、貿易部門的官員施加壓力來直接推動特別是中美經貿關係；這些企業往往是中國地方當局主要的稅收來源，它們的發展與地方建設休戚相關。各地紛紛根據自身特點與美國地方建立直接聯繫，並出台一系列優惠政策來吸引美國企業，盡可能為當地企業創造一個優於其他地區的發展環境。

這些行為體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們所進行的活動促進兩國的交流，而且還在於它們所起的傳帶作用使兩國政府對彼此的政策更為敏感。政府國內活動範圍的擴大，再加上公司、銀行等做出具有跨國影響的決定，使兩國國內政策相互影響日益增加，各種跨國交往又加強了這種相互影響。

(二) 國家內部出現利益分化。中美之間的交往對各種團體和組織產生不同影響，某些團體得到了更多的機會，而另一些團體則遭受了更大的損失，兩國國內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利益分化。在此情形之下，國家內部的各個機構將追求自己所關注的目標，儘管若干機構可能會就一些對他們全體都有影響的問題達成妥協，但是要經常維持一致的政策將變得困難。在美國，勞工、產業部門與國務院、財政部等部門對華態度就不一樣。勞工、產業部門試圖構築更堅實的壁壘以保護美國競爭力較弱的行業，而國務院、財政部等希望擴大與中國的交往，前者試圖通過接觸來謀求政治利益，後者則看重經濟利益。

中國政府具有較高控制力，各部門在對外交往中保持了很強的一致性。但隨著中國與外界聯繫加深，也出現了多樣化的趨勢，例如中國國內各部門在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中利益得失差別較大，對於中美在關係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產生了一定影響。中國問題專家江憶恩

(Alastair I. Johnston)認為⁸：

當中國從國際體制中得到利益並開始認同時，新的利益集團就會隨之出現。與國際體制協調一致將反映那些在國際體制範圍內進行運作而獲得好處的集團的利益。例如，中國的那些因自由貿易和開放國外市場獲利的團體，會熱衷於通過支持中國參加那些保護自由貿易的國際組織，以求保留自己進入國外市場的權利。

中國在1996年春天購買歐洲空中客車客機而不是波音客機的決定，是在否決了外交部美大司的建議後做出的。在這一決定中起關鍵性作用的行政部門是外經貿部，它希望報復美國對其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工作提出的尖刻批評。⁹中央和各部門各地方之間的關係也呈現多樣化趨勢，中美關係直接和間接地影響到利益的分配問題。例如，北京同意擴大市場准入的範圍，而許多地方政府卻可能採取變通的做法，保護自己的市場不受美國產品的競爭。北京保證堅決支持保護知識產權地，而地方政府卻可能為增加體地區的收入，積極支持剽竊知識產權。¹⁰

(三) 兩國間議題多樣化。與經濟利益相關的一系列議題取代政治關係和軍事鬥爭成為兩國關係的主軸。正如美國蘭德公司前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羅門指出：貿易、金融和技術的流動變化將決定新時代的力量現實與政治，國家安全觀正從傳統的軍事實力均衡擴大到經濟領域，商業與技術力量同軍事力量一樣，都是國家實力與影響的重要組成部分。¹¹現在一國的經濟狀況受到相關國家和世界經濟形勢的影響，如該國經濟結構、產業政策、金融政策、資源開發、國內分工、產品開發、外貿出口等。經濟力量強大的國家可利用市場、金融、科技和國際分工等手段來影響乃至控制別國政治、經濟甚至軍事政策的走向。而作為實現國家政治利益的手段，軍事力量的作用降低了，軍事手段的運用更加側重於威懾，更注重於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軍事部署和軍備建設著眼於加強旨在防止地區衝突的快速反應能力。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美兩國都意識到發展經濟的重要性，紛紛將資源投向經濟建設，將國家經濟利益的維護和擴展作為國家對外戰略的最主要出發點。中美打破國界限制、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展開了大範圍、多層次、高效率的經貿合作。兩國都根據國內社會各界特別是企業界的要求確定自己的國家利益，積極展開「經濟外交」，時而推動雙邊的經濟合作，展開技術交流，舉辦貿易洽談會，時而發動經貿戰、金融戰，實行進出口限制，設置關稅或非關稅壁壘。除了經濟議題之外，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同美國這個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在維護世界及地區和平與穩定，促進全球經濟增長；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推動亞太區域合作，打擊販毒、國際有組

織犯罪和恐怖主義問題上；在加強雙邊經濟發展、貿易、法律、環保、能源、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與合作以及兩國軍隊往來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合作潛力。」¹²兩國在這些方面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協調和合作的同時也就人權問題、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問題、台灣和西藏問題及國際新秩序的建立等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三、相互依存對外交戰略的影響

兩國經貿關係持續發展，給兩國帶來巨大經濟利益同時也影響了彼此對對方的看法以及對利益的界定，促使兩國突破舊有的觀念和規則，在對外行為和決策中認可相依共存的現實前提，愈來愈重視在接觸中施加影響、在交往中尋求國家間的共同利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擴大與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經濟往來，取得世人矚目的成就。二十多年的成功經驗使中國認識到「中國擁有廣大的市場和發展需求，美國擁有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巨大的物質力量，兩國之間有著很強的經濟互補性。中國的潛在市場同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資金優勢結合起來，就能形成眾多的發展機遇和強大的發展活力。」¹³。中國只有在交往中才能壯大自己，才能有效地對美國以至整個世界施加影響，從而為自身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中國對世界的認知發生了深刻變化，不再以打碎現存國際體系為目標，而是力圖融入國際體系，在參與國際博弈的過程中，對涉及人類前途和中國切身利益的決定或規則體系施加影響。中國正在以一種和諧的主體意識、主動的進取精神參與國際社會，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平等協商、友好交往，避免用武力等激烈的方式打破現存的國際關係秩序，避免提出過份的利益要求與表現出過度的擴張性，並設法消除他國對自己實力的增長而產生的疑慮，致力於構築一種務實的、靈活的中美關係，從而形成對雙方都比較有利、雙方都可以接受的雙贏局面。

美國在華取得的巨大經濟利益，不僅使美國消費者和企業直接獲利，而且對美國宏觀經濟增長也產生重要影響，使得美國開始以較客觀眼光來看待中國的發展，採取更務實、更靈活的方式來處理中美關係。特別是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出色表現，使美國看到中國目前正在以一種建設性的方式參與國際社會，中國正朝積極地方法發展，是一個負責任的、可以合作的大國。美國學者內森(Andrew J. Nathan)和羅斯(Robert S. Ross)指出：中國「一直是支持維持現狀，致力於參加各種國際機制，而不是破壞這種機制」。¹⁴美國意識到中美在經濟發展上和安全環境的相互依賴程度明顯加深，只有保持彼此的溝通與合作才能促進自身利益的發展，而對抗和衝突則會給兩國帶來滅難性後果。美國前總統克林頓也指出：「我們確實需要一個正常的經貿關係，這樣就有機會最終在某些對於美國乃至世界至關重要的問題上，與中國達成一致。」¹⁵「如果美中商業關係惡化，中國在美國所關心的非經濟問題上進行合作的積極性就不會高。」¹⁶美國認識到中國「將在下世紀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經濟強國，中國勢必對全球工商、金融、政治發揮日益增長的深遠影響，二十一世紀時中美關係將具有首要的重要性」¹⁷，「應鼓勵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一個全面而完全具有建設性的參與者」。¹⁸美國對中國實施接觸戰略，日漸把中國作為地區與全球大國的崛起看成是一個進步現象，改變長期以來對中國的消極看法，重建兩國間機制化的全面交往，盡可能多使中國參加國際組織，從而力促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使之能真正參與制訂並切實遵循有關國際規則。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提出「接觸必須意味著不僅僅給中國以遵守規則的機會，它要求承認中國的利益並就符合美國和中國目標的解決方法進行談判」，此外，「接觸還要求與中國的

四、相互依存對國內政治的影響

中美雙邊關係全面而深入地發展使兩國各種利益交織愈來愈緊密和複雜，在交往過程中某些群體得到了更多的機會，而另一些群體則遭受了更大損失。在美國，對華政策有關的利益集團開始根據自身利益重新去界定中國問題的框架，並試圖通過不同途徑對美國對華決策施加影響來實現各自的目標。這些利益集團的活動使得許多國會議員「加大了將其有關中國的投票與熱門問題相連的趨勢」²⁰。而且眾多決策部門也從各自的角度和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立場出發，提出外交政策建議，「每個重要的部門似乎都能實施最符合自己優先考慮的各自的對華政策：商務部極力促進中國吸收美國的投資；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則不斷揚言要就知識產權和其他問題實行懲罰性的貿易制裁；國防部促進軍方對軍方的接觸，國務院的一些部門則抨擊中國所謂的核擴散活動和侵犯人權的行為。」²¹中美經貿關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在給美國工商界在帶來巨大出口和投資機遇的同時，也加劇了對某些勞動密集型行業的衝擊。經貿關係的發展擴大了兩國的共同利益，加強了支持穩定中美關係的利益集團的影響，但隨之而來也產生了一些問題如貿易不平衡、知識產權、市場准入等問題。

在眾多問題之中，對華最惠國待遇問題最為突出。該問題屬於一種處於國內和國際事務之間的中介事務，涉及的利益也十分複雜，以美國工商業、進出口業、農業和零售業為主體的支持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利益集團和以人權、勞工和極右宗教組織為主體的反對派陣營圍繞這一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奪。反華利益集團利用北京政治風波後美國公眾對中國印象急劇惡化的大環境，通過新聞媒介大肆渲染中國所謂「破壞人權」的行為，並指責美國工商界缺乏道義感，要錢不要人權。他們的宣傳在很大程度上煽動了美國民眾對華逆反心理，給美國政府改善對華關係造成巨大阻力。人權組織還與政治保守派以及東南部紡織業州的議員同盟，合作提出取消對華最惠國待遇或對其附加條件的立法案。如1991年反華利益集團聯合部分國會議員炮製一系列要求限制中國出口的提案，藉口限制中國勞改產品出口，為兩國貿易設置種種障礙。以美國商務部、美國製造商協會、美國商會和美國外貿委員會等機構都認為中國是它們合作的夥伴，支持美國政府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美國商業集團或聯名公開致函克林頓總統和國會議員，或者發表聲明、在國會聽證會上陳述自己的立場。如1993年5月，美中貿易商界聯盟中的298家大公司和37個團體由美國緊急貿易委員會副主席卡爾曼·科恩發起共同聯名致函克林頓總統，要求無條件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信中指出對中國產品進入美國市場採取任何限制都將會引起適得其反的結果。在以美國商界為主導的對華積極派地推動下，美國政府擺脫了反對派的層層阻撓，每年都給與中國最惠國待遇，而且在2000年9月，美參院終於以83票對15票的壓倒性多數獲得通過對華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議案，從而結束了美國對中國貿易地位年度審議所引起的曠日持久的激烈爭論。

由於中國經濟與外界，特別是美國聯繫更緊密，中國努力將良好的國家政治關係轉化為實際經濟利益，防止國家政治關係的惡化過多地影響雙方的經濟關係。大量專業性人才，特別是熟悉國際金融和貿易的人才，進入重要的國家機構，他們致力於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推進國際貿易。中國對美決策相對集中，但隨著相互依存關係的發展，雙方聯繫日益廣泛，與之有關的部門、領域和地方也有增多的趨勢。除了傳統的外貿、外宣部門外，對美決策還要涉及教育、文化、軍隊、法律、人民團體的非政府機構、公司企業和地方省市等。在對美關係決策相關單位增多之後，有效地控制管理和協調各種關係和利益成為中國對美關係決策進程中

一個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²²中國一般採取內部、學術討論和徵求意見等各種途徑充分展開討論。現在一些公開出版的書籍也會對中國的對美政策提出批評。²³現在中國的一些思想庫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中國國際戰略協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等對關於中美關係的許多研究成果被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所採納。中國政府在重要政策出台前或是中美之間發生重大突發事件後，愈來愈多召集有關學者參與商議。

五、中美相互依存關係的特點及對策

在相互依存關係中，對等的依存關係和純粹的依附都是很少見的，不對稱相互依存是最常見的情形。中美在經濟上相互依存，兩國之間的依存關係也是不對稱的，目前中國對美的依存程度要高於美國對中國的依存程度。

從貿易額來看，根據2000年中方統計數據，2000年，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中國對美出口已超過對日本和香港的出口，達521億美元，佔中國出口總額的21%，加上從香港轉口的221億美元，比重高達31%。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為224億美元，僅佔美國出口總額的2%，中國只是美國的第11大出口市場。另外，中國對美貿易一直是順差，2000年為297億美元，而該年中國外貿順差總共才242億美元。不言而喻，如果沒有對美貿易的順差，則中國外貿就會出現逆差。²⁴

從貿易結構來看，中國主要向美國出口紡織品、服裝、鞋、玩具、家用電器等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美國主要向中國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如飛機、動力設備、機械設備、電子器件、通訊設備和化肥等含有相當先進的技術的產品。中國對於動力設備、電子器件特別是一些高新技術的依賴要大於美國對於紡織品、服裝、玩具這些消費品的依賴。美國可以較輕易地從其他地方找到替代品，而中國則需付出高昂的代價才能獲取不見得好的替代品。例如信息時代的基本元素個人電腦，它關鍵性硬件電腦芯片以及關鍵性的軟件操作系統的生產都處於美國的絕對控制之下。不僅如此，美國同西方國家的經濟聯繫、融合程度遠大於中國，美國具有選擇替代性市場的足夠空間以及操縱世界市場的經濟能力，這是中國所不能匹敵的。而且，美國作為全球軍事大國，在各個重要的戰略區域都有軍事存在，例如中東這一能源中心以及由中東經印度洋、馬六甲海峽到東亞的戰略通道都在美國的控制之下。在情勢危急時，能源的控制可成為美國制約中國的重要手段。

但是中國是一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國家，政府決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穩定性。當某項決策作出以後，中國全國上下都能全力以赴承受政策改變所需付出的代價。中國政府處於強有力的地位，企業界和輿論界對於政府決策的干預非常有限。而美國是三權分立的國家，權力分散，相互制衡，決策過程十分繁瑣和複雜，其弱點是效率低下、缺乏連貫性。各種地方性的、行業性的組織和圍繞特殊問題形成的利益集團，特別是實力雄厚的大財團積極參與並影響著美國政府的決策。所以一旦中國政府下定決心為了適應新情況而改變政策，中國能夠付出所需代價並將政策按既定方針貫徹下去；而美國一項新政策要經過各方論證再通過繁瑣程序才能出台，隨著時間的推移該政策還會出現反覆。所以在脆弱性問題上，中國在政府意志方面較美國具有一定優勢。鑒於這種形勢，中國在處理中美關係時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一）在中美相互依存關係中，中國與美國總的力量對比處於弱勢，對美國有較大的依賴性，中國應當積極主動地推動中美關係的發展，當兩國在影響中美關係全局的重大問題上產生激烈矛盾時，中國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實施靈活的外交策略，在具體問題上根據力量的

對比、利益的大小做出適當讓步。中國也應發揮自身長處，如在脆弱性、國家政策實施能力等方面較美國有一定優勢，謀求在中美相互依存關係中的利益最大化。

（二）中國在參與美國佔主導地位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前提下，必須尋找和創造更為廣泛的經濟合作範圍和經濟增長點，減少中國經濟對美國的依賴性，爭取最大程度地避免中國的經濟發展受美國外交政策或經濟形勢的影響，同時也可以使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降到最小程度。在高度重視中美關係的同時，要注意避免外事工作以美國中心的錯誤傾向，切實展開多邊外交，減少中國對美國政策調整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三）中國要更加重視非政府行為體在中美關係中的作用，特別是利益集團和大眾傳媒的影響，在交往中要適當照顧它們的利益，鼓勵和引導它們對中美關係產生正面影響。積極發展中美多渠道、多層次的交往，保持兩國信息傳遞的暢通，避免因誤解而產生不必要的矛盾。

（四）中國要充分重視由於交往而帶來的利益分化，一方面認真分析美國政府內部的不同利益傾向，針對性地展開工作，積極發掘和利用美國政府對華決策中的有利因素；另一方面注意本國各部門間、中央與地方的分歧，做好統籌協調工作，對外要保持高度一致。

（五）中國要建設性地參與國際制度建設，在尊重其現有規則的基礎上務實地提倡漸進式的改革從而使國際制度更加公平、合理，能夠充分反映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與此同時，在多邊體制中以相互有益的方式協調兩國關係，建立中美協商機制，推動中美關係不斷向制度化方向發展，以期加強溝通、增強互信使中美關係更加平穩地發展。

註釋

- 1 現在國內大部分學者都傾向於使用「相互依存」而非「相互依賴」這個概念，其實兩者都來自英文interdependence。為了行文方便，本論文統一使用「相互依存」這個概念，在遇到「相互依賴」時也將之換為「相互依存」。應注意，「相互依存」主要指相互影響，不能與「相互共存」等同。
- 2 參見《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各年版）；U.S. Census Bureau. (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
- 3 Department of State, Basic Facts on China's MFN Status, May 2, 1997.
- 4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關於中美貿易平衡問題〉，《人民日報》，1997年3月22日。
- 5 《世界展望》，2002年第3期，第39頁。
- 6 參見王泰平主編：《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頁172。
- 7 引自《世界知識》，2002年第6期，頁28。
- 8 江憶恩（Alastair I. Johnston）：〈中國參與國際體制的若干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1999年第7期。
- 9 參見沃格爾（Ezra F. Vogel）主編，田斌譯：《與中國共處：21世紀的中美關係》（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頁240。
- 10 參見注9《與中國共處：21世紀的中美關係》，頁239。
- 11 參見薩本望：〈新型的「地緣經濟學」〉，《世界知識》，1995年第5期。
- 12 〈中美發表聯合聲明〉，《人民日報》，1997年10月31日。
- 13 江澤民1997年11月1日在美國哈佛大學的演講。

- 14 內森 (Andrew J. Nathan)、羅斯 (Robert S. Ross) 著，柯雄等譯：《長城與空城：中國對安全的尋求》（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頁224。
- 15 楊東等主編：《時局：以中國人的視角看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17。
- 16 注9《與中國共處：21世紀的中美關係》，頁158。
- 17 "America's China Syndrome", in *U.S. News and the World Report*, October 30, 1995.
- 18 Madeleine K. Albright, "The Test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77, No.6, Nov/Dec, 1998, 57.
- 19 Robert S. Ross, "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7, p.43.
- 20 趙寶煦主編：《跨世紀的中美關係》（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頁361。
- 21 注9《與中國共處：21世紀的中美關係》，頁234。
- 22 參見楊潔勉：《後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外交政策比較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104。
- 23 參見注22《後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外交政策比較研究》，頁271。
- 24 陸建人：〈從經濟視角剖析中美關係〉（<http://goglobal.myrice.com/c7.htm>）

朱聽昌 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國際關係教研室主任、教授。

黎翔 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研究生。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二期 2003年3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二期（2003年3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